

“洋品牌”何以敢“南橘北枳”

□木须虫

据《京华时报》报道,近日有网友曝光麦当劳密云云鼓楼餐厅曝晒包装破损的汉堡原料面包,包装内水汽蒸腾。麦当劳有关负责人随后表示该批次面包已被处理,决不使用,并已对该餐厅进行严肃处理。专家表示,汉堡包装破损可能会滋生大量微生物,会对人体产生严重危害。

继味千拉面陷入了“骨汤门”、肯德基“豆浆门”事件后,麦当劳又成了新闻的主角,除了麦当劳北京密云云鼓楼餐厅原料运输管理混乱之外,另有媒体又曝出长沙麦当劳鸡翅吃出“活蛆”,再往前,3月重庆沃尔玛发生过期板鸭油炸后当热卖事件,而去年沃尔玛与家乐福等超市巨头屡屡

上演“价格戏法”,欺诈消费者,这一系列的事件令人对“洋品牌”的形象大失所望。

一直以来,“洋品牌”在消费者心中都是品质与信誉的保证,甚至出现了“达芬奇”一类“伪洋品牌”,“借光”坑害消费者。“洋品牌”自甘堕落,打破了“洋品牌”不可质疑的神话。于是,消费者不禁要问:这些在国外言行举止颇为规范的“乖孩子”,咋一到中国就“变坏”了?

其实,从表面上看,“洋品牌”的这些行为不仅严重违反商业诚信准则,也与其企业的宗旨相去甚远。但必须看到的是,诚信不仅仅依靠商家的道德自律,更在于公共社会管理。比如,在价格欺诈方面,欧洲一瓶售价1欧元的矿泉水没标价被执法人员发现,就有可能就被罚两万多欧元;

而在食品安全方面,在美国即便是炸油条,所用的油只能炸一次。如果中国也有如此细致的严格规定,曝晒的原料面包以及生蛆的鸡翅如何会进入销售环节?

事实上,“南橘北枳”的典故早就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土壤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麦当劳、沃尔玛等虽然是“洋品牌”,但入驻中国,无论是法律、市场环境还是文化背景,都离不开中国的影响,让这些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有了“中国芯”。如此,作为商业机构,本质上与国内的企业并无二致。因而,对其倡导的商业文化与准则可以期待,但绝不能抱以过高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品牌”神话的破灭,未尝不是件好事。“洋品牌”自甘堕落、道德沦丧,其实还是一

张试纸,可以检验出市场环境的“PH值”:一方面,说明现行的法律法规没有足够的威慑力,违法成本实在是太低,比条文过粗、消费者权益维护途径单一、狭窄等,法制的环境起不到警戒作用,相反对其非法牟利是变相的纵容;另一方面,说明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缺乏有效的手段,除了罚款,似乎束手无策。所以,无论是肯德基“豆浆门”的欺瞒,还是麦当劳的违规操作,除了消费者的口诛笔伐之外,恐难有适用的法规予以严惩。

“洋品牌”相继失信有其必然性,面对他们集体堕落的趋势,如若只是局限于个案处罚,而不反思“洋品牌”违法的客观环境,那么,还会有更多的相继入“门”,这不仅是“洋品牌”的悲哀,更是国人的隐痛。



学生集体跨省补课 谁之过

据新华社报道,山东德州一所中学为了逃避检查,400名高一学生跟老师集体到河北省一所学校进行补课。按照学校要求,补习一个月,每人要交1000元补习费。学生称,补课自愿,但是假期补课的内容,开学后老师就不再重复讲了,因此只能听从学校安排。

■有这样“自愿”的吗?简直就是变相绑架学生啊。

■国家虽然明令禁止不得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和教师的唯一标准,也屡屡下发文件规定不得补课或变相补课增加学生的学业负担。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听说过很多补课现象,但这种“跨省补课”,还是头一次听说,真的是太有才啦。

■补课也玩“跨省”,有关部门赶紧来个“跨省抓捕”吧

■嗨,你不补,别人补,所以你可能就会落在别人后面。

■不从根上治理,这种现象就会一直存在。

■为什么要跨省?根本原因在哪儿?这些才是主要问题。

■是啊,根本问题解决不了,应试教育病根不除。现在是跨省,以后就是跨国,不行就坐飞船去火星,出太阳系,出银河系,出宇宙……

■唉,都是追求高分惹的祸。

■也不能全怪应试教育和分数。有些人以补课的名义办班、讲新课以达到“致富”的目的。为了钱,上级的话可以不听,家长的呼声可以不管,学生的健康可以不顾,为人师长的道德可以不要。挣钱才是硬道理!

■是啊,数学要补,语文要补,历史要补,那师道为什么不补?灵魂为什么不补?该补的不补,不该补的狠劲补。

■没办法,谁叫现在仍然是一考定终身,分数决定一切呢?

■是啊,用人单位要是取消凭文凭招聘的话,还会有多少人为了文凭上大学?考名校?

■还给学生一个自由的假期就那么难吗?

■假如我们不能真正摘掉戴在学校头上的要分数、要名次的“金箍”,不能彻底打破利益纠结的链条,学生拥有一个自由的假期、素质教育等都是虚无缥缈的口号而已!

学生“威胁要分”与老师“卖分送分”

□李继彦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受到一名学生索要高分的持续威胁之后,南京一所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的教师杨华报了警,以“维护自己作为一名教师的尊严”。而让杨老师不解的是,老师和领导们明明知道真实成绩对学生意味着什么,还默许学生“跑分要分”。

单就“跑分要分”的个案而言,该生不仅犯错,而是涉嫌违法。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因此,无论站在师道尊严还是法律尊严的角度,杨老师的“较真”都无可非议。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来自学校领导、同行以及学生的“冷嘲热讽”。“这个老师太较真了,又不是专业课,把分打高就行了。”“你觉得像你

这样的人,每天像个怨妇一样,会有学生尊敬你吗?”更让人不解的是,副院长居然为了“学校的名声”劝杨老师“不要过于紧张”。难以想象,学校竟用这种方式维护所谓的“名声”。从师生的“冷嘲热讽”和领导的态度中,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学生“跑分要分”绝非个别现象。

事实上,在每次考试之后,很多老师都会接到不少“要分电话”,打招呼的多是同事和领导,其中也不乏学生。遗憾的是,敢于说“不”的老师并不多。由此,我们或许又能得出一种结论:“卖分送分”亦非个别现象。

一个学生的威胁短信也许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弥漫在大学生校园中的“跑分要分”和“卖分送分”现象。“跑分要分”不仅亵渎了大学精神和师道尊严,更亵渎了公序良俗和社会正义。应该说,每一个“跑×要×”都对应对应着一个“卖×送×”的权力寻租。学生对“跑分要分”乐此不疲,恰恰是学校和一些老师“卖分送分”的结果——没有“卖分送分”,何来“跑分要分”?

上座率 107% 自娱自乐的“真”数字

□吴睿轲

据《扬子晚报》报道,铁道部发布消息称,京沪高铁开通运营一个月以来,平均上座率达到107%。但据多家媒体报道,现在京沪高铁“每趟都有大量空票”,商务座基本上是空的,在“运凳子”。

所谓“列车上座率”是指购票上车的旅客人数与列车定员的比率,京沪高铁列车途经多个车站,每个车站都有乘客上车、下车,把每个车站上车的乘客人数相加,再除以列车定员,就得出列车上座率。这意味着,即使某趟列车从北京到上海始终有大半座位是空着的,但统计出来的上座率却可能超过100%。

这就像一家餐馆,总共有10张桌子,做了一天生意,从早忙到晚,一共迎来了11桌食客,店老板于是自豪地对外宣称:今天的生意真好,顾客盈门,桌子都不够用了!

现实中不大可能有这样自欺欺人的老板,却有这样自娱自乐的统计数字。确实有人热衷于并且擅长于在统计数字上做文章。说京沪高铁上座率达到107%是弄虚作假,没有证据,人家只是采用了一种比较“高明”的统计方法;说这是自欺欺人似乎也不妥当,那么比较恰当的说法,就剩下“自娱自乐”了——你看数字,我们看现实。你要自娱自乐,我们权当看热闹。

“恭喜”烈士父亲 暴露官员三大缺失

□范子军

据《羊城晚报》报道,广州消防战士姚携炜为救跳轨者而英勇牺牲,增城市公安、消防、新塘镇政府及当地街道等多个部门登门慰问其家人,一名政府官员递上慰问金,握着姚携炜父亲的手说:“恭喜你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姚携炜的父亲愣住了。

消防战士救人牺牲,本是一件让人无比悲痛的事,登门慰问的官员却道出一声“恭喜”,不用说家人会何等错愕乃至愤懑,就是围观者也会觉得超级滑稽且无法容忍。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曾经有位作协官员的追思文章里,竟然也出了纵鬼魂也幸福之类的词句,一度激起网民的愤怒声讨。

时而出现不合时宜的“恭喜体”,折射出少数官员的三重缺失:一是文化素养的缺失,在特定的语境下,往往难以恰如其分地表达情感和态度;二是应变能力的缺失,他们习惯了用一种官腔、套话应付各种场合的“以不变应万变”,一旦遭遇特殊场景,就容易出洋相、闹笑话;三是民生关怀之心的缺失,也是最根本的一种素质缺失,平时心中极少装着基层、民众的疾苦、冷暖,当然就难免会道出如此冷血的话来。不然的话,只要有一点平常心、爱心,绝不可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在悲情笼罩的氛围里,会道出如此叫人不堪的“恭喜体”来。

副市长周游 60 国,多乎哉? 不多也!

□椿桦

据人民网报道,最近有位官员透露了曾去过的国家数字:60多个。他叫徐进,是四川省宜宾市的常务副市长。徐副市长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自称“去过60多个国家”,引发网友围观与质疑。宜宾市委宣传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徐副市长说去了那就是去了。但是,刊发该报道的宜宾新闻网随后将“去过60多个国家”这句话删掉了。

为什么删掉“去过60多个国家”这句话?个中原因当然不难揣摩。这个细节莫非说明“去过60多个国家”并不是件正大光明的事儿?事情到最后,还是成了自抽耳光,这种处理问题的手法无疑是低水平的。

我充分相信,副市长同志声称去过60多个国家,有着很明显的炫耀成分,旨在证明自己有着国际化的管理眼光。这句话的完整版是:“我去过60多个国家,深深懂得规划先行对于城市发展的至关重要性。”不管怎么说,“懂得规划先行的重要性”远比不断考察奶牛、到沙漠考察海洋,或到泰国观赏人妖,要上得了台面。可是“上面”惯用的“删节功夫”,却弄巧成拙,将这冠冕堂皇的理由搞得站不稳脚。

一个官员一生中要去多少个国家,才能获得“国际化管理经验”?这些“经验”都派上用场了吗?譬如,城市规划先行很重要,可我们的许多城市一遇到暴雨,怎么还是积水成灾?反复考察南斯拉夫奶牛场以至于奶牛都能认出中国官员,为何我们的奶牛问题频出,甚至生乳至今仍是“全球最差的标准”?所以,不能怪“出国考察等于公款旅游”的民间质疑没道理。

一个官员周游60国多乎哉?我认为不多矣!咱们帮徐副市长算笔账。据宜宾市委宣传部



解释,徐副市长2002年到长江商学院读EMBA,到现在大约9年时间,平均下来每年去的国家数量约为7个。现在徐副市长还算年轻,而最新的公示还表明,他是宜宾市长候选人,按照他的出国频率,联合国190多个成员国全部走遍是没问题的。

实在不想将徐副市长的出国次数与其他许多官员联系起来,但你又不得不怀疑,“周游60国”不是个别现象。我们真的需要以2个月不到就出国一次的频率去“考察”吗?这种考察是工作还是福利?鉴于新闻网站被删去那句关键词,公众的怀疑理所当然地会加深,而我也理所当然地发出了上述感慨。

@ 网络微评 @

曹林:去过60多个国家的副市长,未必真是公款出游,或者说,这60多次未必多数是公款出游。可在“三公消费”不透明,出国考察很神秘的情况下,问题就说不清楚了。不仅是“60次”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公众一听到出国考察,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旅游和腐败。

羽人三:公开资料显示,联合国目前有193个成员国,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列举的国家(地区)总数也只有199个。徐副市长就去过其中60多个,这还不排除某些国家去过多次的情况,如此看来,徐副市长出国次数之多确实令人“惊叹”。他60多次出国的理由是什么?又都学到了啥?